

中国文化经典直解

学术顾问 姜亮夫

书

经

直解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文化经典直解

书经直解

张道勤直解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余文军

封面设计：梁 珊

中国文化经典直解

书 经 直 解

张道勤 直解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73000 印数 00001—15000

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9-0771-X/I·713 定价：9.00 元

《中国文化经典直解》

序

几年前，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青年教师论文报告会上，我对大家说，我们的学术与西方学术的概念是有些不同的，我们的学术里面有“道”。每一种学术，都有它自己不可磨灭的“道”在。当然，这不可磨灭是一个时间概念。有一万年的不磨灭，有一千年的不磨灭，有些学术，可能几年后就要磨灭了。清末民初，有一位先生说：读书有君子之学，有小人之学，有妾妇之学。意思是说，有些学问惊天动地，是君子之学；有些学问听起来很好，实际无多大价值，是为小人之学；还有一些学问，只供妇人小孩娱乐之用，所以说是妾妇之学。把学问分为三类，不是他的发明，韩昌黎、苏东坡都说过。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学问？希望大家搞一些光明正大有价值的学问，不要搞叽叽喳喳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东西。

我们中华民族已经有六千年的文明史，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，有丰富的文

化典籍，这是极为宝贵的遗产。搜集、整理、注释出版其中的代表作品，使一般文化水平的同志能够阅读、使用、受到教益，乃是研究机构、出版机构的职责。最近，浙江文艺出版社决定组织出版《中国文化经典直解》丛书，选择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影响至深且巨的著作，诸如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楚辞》等二十余种，一一校理，附以今注，原原本本、平易简要地介绍给今天的读者。这些作品，有的已经流传数千年，短的也在千年以上，它们之所以历久不衰，亘古常新，甚至风靡世界，究其原因，正是有其不可磨灭的“道”在，这就是民族文化之“道”，中国文化之“道”，于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，伦理道德，乃至行为方式诸多方面。这是可以感触得到的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大凡传播久远的作品，往往注家蜂起，代代积累，形成专门之学，这在学术发展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文献价值，不应采取轻率的态度。但是，旧注过于繁重，即使是提取一部分作“集注”，也难以为今天的广大读者所用。而最方便利用的“今译”，又难免违失原作之精神面貌。有鉴于此，《中国文化经典直解》丛书采

用直解方式，即贯通诸家说解，益以新知新见，径用今语注出，不事征引；正文大字，注释小字，夹注于正文当句（字、词）之下，以便阅读。这项工作，看似寻常，实为不易，不仅要读很多的书，广泛收集历代注疏资料，还须综合分析，由博返约，由表及里，融汇贯通，始能用平常今语流畅注出。毫无疑问，这将给读者以极大的便利。我相信，《中国文化经典直解》丛书的出版，一定会受到广泛的欢迎！

滕叟姜亮夫口述
弟子崔富章记录整理

前 言

《书经》本称《书》，汉时称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在西汉武帝时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，故后世一直奉为经典。宋明之际，四书五经为统治者所提倡，《尚书》又是士子科举进身的必读之书，故《尚书》又被径称为《书经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古之王者世有史官，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、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”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，也有的文献资料上书作“右史记言，左史记事”（见《国语》及《礼记·玉藻》）。不过，无论记言记事，均出自帝王身边的史官，所以说《尚书》是记言体的史书，也是无可争议的。当然，就现存诸篇检视，也确有如后世史学家所指出的“为例不纯”（见刘知几《史通》）的现象，但书出上古，文体初分，其时体例不严，原不足怪。

《尚书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方档案文献资料之一，最初篇数无从考知，相传孔子曾经

对它作过删削整理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《书》之所起远矣，至孔子纂焉，上断于尧，下讫于秦，凡百篇，而为之序，言其作意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也说：“《书》之所兴，盖与文字俱起。孔子观书周室，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，删其善者，上自虞，下至周，为百篇，编而序之。”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教育家，是最早将贵族文化向平民阶层普及的大学者。他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订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赞《易》道，修《春秋》，把前代典籍删繁撮要，编为教材，用以教授生徒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他删留《尚书》百篇，如同现在的学者做教材选编一样，目的只在于有重点地讲授，不至漫无纲领而已。可能正由于他的删编，《尚书》才得以普及。春秋末至秦统一六国前的一段时间，社会上通行的传本，可能就是经他删定的百篇《尚书》。

秦统一六国后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但秦始皇三十四年，采纳李斯的建议，大焚典籍，以苛酷的刑罚严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的传习，却使历史文化遭受了空前的灾难。上古典籍几被禁绝，所可幸存者，惟秦记、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据《史记·儒林传》：“伏生者，济南人也，故为秦博士。秦时焚书，伏生独壁藏之。

其后兵大起，流亡。汉定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齐鲁之间。”秦时纸张尚未发明，书籍多以竹木简牍串结而成，体积笨重，不便储藏，加上当时读书人不多，传抄也非易事，故焚书禁学，容易做得彻底。幸好秦仅二世而亡，自统一至灭亡，前后仅十四年。其时《诗》以歌咏讽诵，尚能传在人口；《春秋》以编年形式次序事件，便于记忆，加之张苍藏有《左氏传》，故得完好无缺；礼书散亡虽多，却行之于社会交际，而《易》则以卜筮幸存。故前代学者说，秦时焚书，五经中《尚书》独受其害。原因是《尚书》文字极古简，诘屈聱牙，难于记诵，离开文字记录，即专攻《书》如伏生者，也无法使百篇复原，故仅以所存二十九篇教授。学者推测，伏生壁藏之书，当系以秦篆或古籀文字写成。汉初，社会上通行的是隶书，伏生向生徒传授时，必将古文字易作“今文”，故汉以今文《尚书》立学，伏生被推为今文《尚书》之祖。

今文《尚书》而外，汉代又有所谓古文《尚书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古文《尚书》者，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，鲁共王坏孔子宅，欲以广其宫，而得古文《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凡数十篇，皆古字也。共王往入其宅，闻鼓琴瑟钟磬之音，于是惧，乃止不坏。

孔安国者，孔子后也，悉得其书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安国献之，遭巫蛊事，未列于学官。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，《酒诰》脱简一，《召诰》脱简二。率二十五字者，脱亦二十五字；简二十二字者，脱亦二十二字；文字异者七百有馀，脱字数十。”

这段话，大半取自刘歆《让太常博士书》，虽有传闻的成分杂糅其中（如“共王往入其宅，闻鼓琴瑟钟磬之音，于是惧，乃止不坏”），也有人物时间上的差错（如清人阎若璩指出的，鲁共王坏孔子宅乃景帝时事，安国景帝时为博士，据《史记》，安国早卒。而巫蛊事发生在武帝末年，上距鲁共王坏孔子宅已三十五六年，若其时安国尚在，已至六十岁左右，如此，则与《史记》“早卒”之说不合），但所言鲁共王坏孔子宅并非向壁虚造，说孔安国“悉得其书”，与《史记》所说“孔氏有古文《尚书》，安国以今文读之，因以起家”也正相合。而况有关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，脱简、异字，言之凿凿，故孔壁古文毋庸置疑，而刘向据以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之“中古文”，也必是得之于孔壁而献给朝廷者。欧阳、大小夏侯是今文尚书的嫡传，宣帝时已立于学官。古文《尚书》经刘歆力争，直至平帝元始五年（公元五年）才得立学。但也许如王

充所说，“壁中古文莫能读者”，故终两汉之世，古文《尚书》递相传授的篇目，同于今文二十九篇，而多出的十六篇，却绝无师说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昔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《尚书》的流传也是如此。自伏生教于齐鲁之间，今文《尚书》转相授受，流至东、西汉之际，今文之学便显露出华而不实的弊病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引桓谭《新论》说：“秦近君能说《尧典》，篇目两字之说至十餘万言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对当时学风有这样一段总结：“古之学者耕且养，三年而通一艺，存其大体，玩经文而已，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，三十而五经立也。后世既已乖离，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，而务碎义逃难，便辞巧说，破碎形体，说五字之文，至于二三万言。后世弥以驰逐，故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。”不惟如此，今文经学自相传伏生作的《大传》起，就已微露迷信思想兆头。至董仲舒推步灾异，阴阳五行化的色彩渐浓。流至东汉，由于光武帝刘秀迷信讖纬，说经者不惜穿凿附会，又使今文经学的传授，杂有了更多的不科学成分。

古文《尚书》自孔安国而后，长时间以私学形式递相传授。平帝时虽短时立于学官，但历新莽之乱，至光武时又被废。古文、今文就其源头来说并无二致，但两家传经方式却有显

著区别。范文澜在《中国通史》中对古文经学的传授特点概括有三：“（一）保持朴学的传统，按字义讲解经文，训诂简明，不凭空臆说，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。（二）迷信成分极少或排斥迷信，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。（三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，在政治上主张复古，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——今文经学趋向不同。”范文澜是就今文经学的末流与古文经学作比较而言的，应该说今古文异流而同源，两家传经亦各有所长，在斗争中融合统一是必然的。东汉古文经学者许慎、贾逵都兼治今文经学，古文经学家马融的弟子郑玄，更是破除门户之见、兼采两家之长、删裁繁诬、遍注群经、令天下学有所归的集大成者。

《尚书》在传授过程中除有今古文之争外，还有所谓真伪之辨。伪书的出现，多与典籍的散失绝传及利禄诱引有关。秦时焚书坑儒，典籍丧失固重，但伴随朝代更迭而生的社会动乱，也常是文化典籍难得长久保存的重要原因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说：“昔王莽、更始之际，天下散乱，礼乐分崩，典文散落”，“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，遁逃林藪。”又说：“及董卓移都之际，吏民扰乱，自辟雍、东观、兰台、石室、宣明、鸿都诸藏典册文章，竞共剖散。其缣帛图书，大则连帷盖，小乃制为滕囊。及王

允所收而西者，裁七十餘乘，道路艰远，复弃其半矣。后长安之乱，一时焚荡，莫不泯尽焉。”

孔壁古文《尚书》，可能散失于王莽、更始之际。不过当时学者已众，民间不乏抄本，故至光武中兴，学者抱负坟策，云集京师，今古文《尚书》的传习未受太大影响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说：“北海牟荣习大夏侯《尚书》，东海王良习小夏侯《尚书》，沛国桓荣习欧阳《尚书》。荣世习相传授，东京最盛。扶风杜林传古文《尚书》，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，马融作传，郑玄注解，由是古文遂显于世。”

杜林所传古文《尚书》，中有漆古文一卷，得自凉州，后儒或疑为动乱之际中秘古文流散西州者，或疑为杜林伪作者。按《后汉书·杜林传》，林父邳成、哀间为凉州刺史，林少好学深沉，从张竦（张敞孙）受学，博洽多闻，时称通儒。王莽败，客西州，“得漆古文一卷，常宝爱之，虽遭难困，握持不离身”。曾出示卫宏等曰：“林流离兵乱，常恐斯经将绝，何意东海卫子、济南徐生复能传之，是道竟不坠于地也。古文虽不合时务，然愿诸生无悔所学。宏、逵益重之，于是古文遂行。”光武之世不重古文《尚书》，杜林传《尚书》无邀取名利的企图，且当时所传古文《尚书》，篇数不出今文《尚书》二十九篇的范围，三家今文尚在，可资校验，故

杜林所传必非伪作。杜林是文字学家，曾作《苍颉训纂》、《苍颉故》，《汉书》称“世言小学者由杜公。”可以推想，他所传的《尚书》，文字上要较通常抄本为可靠，故经贾逵、马融训传，尤其是郑玄注解后，便以压倒的优势，取代了今文独立官学的垄断地位。

但学术的繁荣，须以安定的社会环境作保证。董卓之乱后，历魏晋而至南北朝，社会长期处于不安定的状态，故从整体上看，经学的传习可说是进入了中衰时期。《三国志·王肃传》裴注引《魏略·序》说：“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，天下分崩，人怀苟且。纲纪既衰，儒道尤甚。至黄初（魏文帝曹丕年号），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积炭，补旧石碑（指熹平石经）之缺坏，备博士之员录。至太和、青龙（魏明帝曹叡年号）中，中外多事，人怀避就，……诸博士率皆粗疏，无以教弟子。……正始（魏废帝齐王曹芳年号）中，有诏议褒丘，普延学士。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，而应书与议者，略无几人。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，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，多皆相从饱食而退。”当时学术之衰已至于此，而晋代魏仅四十年来，又历永嘉之乱。刘曜兵入洛阳，怀帝（307—312年在位）被俘，学宫被焚，不惟晋室图籍扫荡殆尽，汉魏石经亦被残毁。章太炎说：“今文欧

阳、大小夏侯《尚书》传至三国而绝。”（《国学讲演录》）章氏所言至三国而绝，指传习乏人，当时汉魏石经尚在，可说底本未失。永嘉之乱后，石经日渐损毁，历元魏而至隋，或废石经建浮屠寺庙，或破为桥基，或用为柱础，今文之传，便连同底本也消声匿迹了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说：“永嘉之乱，众家之书并亡，而古文孔传始兴。”又说：“江左中兴，元帝（317—322年在位）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《尚书》，亡《舜典》一篇。”元帝收拾被匈奴贵族刘聪、刘曜等人残破的基业，尚思以学术作点缀，故托名孔安国传的伪古文《尚书》得乘隙而入，与郑氏所传并置博士。

伪造古文《尚书》献之于朝廷的事，西汉即曾发生过一起。汉时悬赏征集图书，成帝时东莱张霸按百篇之序，造百二之篇，献之成帝。成帝出中秘古文校之，知是伪书。霸自称受自其父，成帝高其才而不诛，直至其父弟子樊并谋反，书才被废（事见《论衡·正说篇》及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）。成帝所出中秘古文，当是孔安国所献孔壁古文《尚书》，虽无百篇，但较伏生多出的十六篇可资验证张霸所献古文同题诸篇真伪，或谓中秘有百篇，恐未必是。历王莽、董卓之乱，朝廷藏书尽归泯灭，孔壁古文由是不存。复经永嘉之乱，“欧阳、大小夏侯之

书并亡”；郑玄所传本之杜林，亦二十九篇，而漆古文仅一卷，纵然出自中秘，也必非全璧，这就给伪造者提供了可乘之机。梅賾所献古文《尚书》，合齐建武中姚方兴所上《舜典》一篇，为四十六卷、五十八篇。该书析今文二十九篇为三十三篇，另造二十五篇，篇为之注。书初出，与郑学并行，因托名孔安国传，篇目亦较郑氏为多，学者不明，遂使郑学者日渐衰微。唐初，太宗以儒学多门，章句繁杂，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《五经正义》，《书》依伪孔传。永徽四年颁行天下，明经取士，遵依此本，由唐至宋，相沿不变。至清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《尚书》依然采用此本，故影响至为深远。伪孔传或疑出自王肃，或疑出自郑冲，或疑即梅賾自作，今人又有疑出自晋孔安国者，总之不离魏晋间学人所托。伪书自唐而后，学者间有疑议，如宋之吴棫、朱熹，元之吴澄，明之梅鹵等。但真正条分缕析，力发孔传及二十五篇之伪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者，是清康熙年间学者阎若璩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至阎若璩乃引经据古，一一陈其矛盾之故，古文之伪乃大明。所列一百二十八条。毛奇龄作《古文冤词》，百计相轧，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，则有据之言，先立于不可败也。”

阎若璩《古文尚书疏证》廓清千年迷雾，是

对学术研究的一大贡献。至此，学者知流传千年的《尚书》标准经注本，实是一个真伪杂糅的混合体。其中可信篇目，亦止同于郑学的三十三（郑本作二十九）篇，而此三十三篇之注，并非出自汉人之手。阎氏的这一发现，大大地刺激了清学者对于《尚书》的研究兴趣。此前，学者多惑于伪孔传，于《书》学研究少有创获。惟朱熹卓识特具，他认为五经之疏，《周礼》最好，《诗》、《礼记》次之，《易》、《书》为下（见《朱子语录》）。在他去世的前一年，曾嘱其弟子蔡沈为《尚书》作集传。蔡氏以十年之力完成先师遗命，其《书集传》颇重义理阐发，曾立学百年，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，被列为标准经注。故由宋至清，蔡氏《集传》可说是对《尚书》研究的最佳之作。伪孔传真相大白后，清学者聘力于《书》学研究，江声首作《尚书集注音疏》，摒弃伪古文及“孔传”，搜集汉儒经说，为《尚书》作注。继江声之后，王鸣盛作《尚书后案》，段玉裁作《古文尚书撰异》。王氏专申郑说，段氏重在释字阐义，辨别今古文。三家之后，孙星衍崛起。孙氏以二十二年之力撰成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，摒除伪篇，不取宋、元、明人旧注，遍采汉、魏、隋、唐经解及清学者江声、王鸣盛、段玉裁、王引之诸家之说，分别今古文，把《尚书》注释提高到一个新的